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六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三〇期（zk2007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黄荣华
【不堪回首】	干校琐忆	牛 汉
【研究述评】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二）	杨 隼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 黄荣华 •

〔何蜀整理〕

我当年是重庆一家大型兵工企业长江电工厂的青年女工，文革时因为看到造反派的宣传队唱歌跳舞很好玩，去参加了，随后被没文化的头头（老工人）安排做些事务性工作，接着被推举到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当常委（分管后勤），更没想到会因上面需要“女代表”而被安排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当了委员其实只是去开开会或进省里和中央举办的学习班受训，平时还是在车间上班。

◇ 意外被推荐上大学

一九七二年初，车间党总支书记张鸣凤通知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有事情要交待。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有那么急，免不了会有点紧张，我快步走到张书记办公室，他却笑嘻嘻地对我说：“黄荣华，好事情来了哟！党委决定推荐你到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去读大学，全厂一共只有五个名额，不容易啊！……”

猛然间听到自己要去上大学的消息，震惊、高兴、激动，好像在做梦一样，心跳加速血朝头上涌……

当时，我正在为入党问题被厂党委搁置而烦恼（因为一个军代表要我做伪证，揭发我们原群众组织中与我一起搞后勤工作的杨明芳有“贪污”，我拒绝了，就压下了我的入党申请不批）。我正想逃避现实，盼望能跳出这个是非之地……

我暂时还不敢把读书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怕她说我年龄太大了，逼我快点结婚，我特别害怕她会又一次反对我去上学。

过了几天，军代表贺主任把我召去，对我说：“听说你要准备结婚了，是真的吗？上大学的事情你怎么考虑呀？周总理有指示，上大学期间是不能谈恋爱，也不允许结婚的哟！你要考虑好啊！是去上大学呢还是结婚？”

我当即态度坚决地表示：“恋爱可以不谈，婚可以不结，书一定要去读！”我给贺主任讲，十年前，我在读中专学校，因父亲去世，家中生活困难，母亲要我退学回家顶替父亲进厂当工人养家糊口，我不敢违抗母命，含泪辍学。现在我能带着工资去上大学，不会影响家庭生活，所以我不想放弃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读书机会。我还告诉贺主任，我准备结婚的对象交往时间很短，才一个多月（我有意把时间说短了一些），只通了几封信，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当时，我那个在辽宁当兵的“通信恋爱”的对象正在回重庆的路上。他是请的婚假，准备回来结婚。他已经三十四岁多了，我也二十七岁了，年龄都不小了。我们在信上约定好了，只要见面后双方没有意见，就结婚，学电影《李双双》中说的“先结婚后恋爱”。他回来后，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相互印象都还算不错。他得知我要去上大学，感到很意外。介绍人王姐说：“等你上完大学再结婚吧，可他有点不放心，他不了解你的为人，担心你上了四年大学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他想先把结婚证办了，你再去上大学。”

我当然不能同意，我告诉他，周总理有指示：上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我要上大学就必须放弃恋爱、结婚。他不好再说什么，一脸无奈地沉默不语。还是我先提出来说：“分手吧，你年龄大了，如果再等我几年，你就快四十岁了。你人不错，条件也好，另外找个适合你的人吧！我相信你会很幸福的！”

就这样，我们带着一丝遗憾，很平静地分手了。

回到家里，我给母亲说了以后，她满脸的不高兴，说：“你都二十七岁了，再读几年书回家都三十几岁了，再想找一个好点的人嫁，恐怕就没得那么容易了啊！我辛苦了一辈子，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要看到你结婚生子，这样我才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才算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爸爸……”

我咬着嘴唇不敢开口，生怕说出一定要去读书的那句话，会刺痛母亲的心。最后还是由母亲自己把话说了出来，她说：“你在读中专校的时候，我让你退学回来顶班进厂，那也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头，你嘴上虽没有说啥子，也没有抱怨过我，但是，我晓得你是舍不得退学的，没读完中专你很不甘心，其实，我也是很心疼你的……这次你又有了一个读书的机会，那是你自己的造化，也许这就是你最后的一次读书机会了，随你吧！我也不拦你了……”她是哭着把那几句话说完的，说完那几句话，流着眼泪，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出门去了。我当时更是难过至极，母亲和邻居一向都说我是个孝顺的乖乖女儿，这次我却要违背母亲的意志了。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再放弃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通知我上大学，我都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我已经下了决心，只要那个人没有明显的残疾，性格不是特别的古怪，我都会嫁给他，因为我很想借助结婚后作随军家属之机离开重庆、离开工厂这个是非之地。况且我都二十七岁了，与我同龄的同事、同学们，有的小孩都在上学了。不过，现在有机会到外省去读书，我可以马上就离开工厂、离开重庆，离开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和事，不用等待还可能是个未知数的“随军”机会，同时还可以圆我十年前的读书梦。这样一举多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呢？

在我即将起程去上大学之时，那位要我作伪证的军代表又一次来找到我，他是厂党委的常委，他说，他是代表党组织跟我作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有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杨明芳有贪污行为，现在就等你站出来揭发她了，因为你和她都在厂八一五联合总部搞后勤工作，你们接触最多。只要你揭发了她，入党问题马上就可以批下来……

对他不讲党性原则，以至赤裸裸的诱惑，我从内心里感到很鄙视。我是个小人，斗不过他，幸好这次我有机会离开他们！

我暗暗告诫自己，这次上大学机会难得（全厂七千多人才五个名额）；能得到母亲的放行，更是难得。我一定要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学习，甚至要拼命学习，消除一切不利于学习的干扰。到学校后不进城玩，不参加学习以外的一切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不担任班上任何职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自己置身事外，不写任何批判文章，不在任何批判会上发言，实在要发言也只照报上的宣传调子，轻描淡写说几句。紧紧抓住自己年龄偏大、离开学校时间太长这两个不利因素作为理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傻子，一只笨鸟，“笨鸟先飞”嘛，所以我得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学业。

◇ 我在同学中年龄最大

一九七二年四月初，我终于上路了，我先坐船到武汉，再转火车去长沙。

火车站台上拉着一条大横幅标语：“热烈欢迎中南矿冶学院的新同学！”横幅下还有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同学们热情地领着我取出了随车托运的行李。军用卡车把我们接到了学院，我们班上的同学又帮着我行李搬到我的宿舍。我到学校算是稍微晚一点的，其他的许多同学都已经提早就到了，同学们热情大方，相互都是见面自然熟，有同学给我倒开水，有同学给我铺床单，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旅途的舟车劳累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同学们基本上都到齐了。我们班的指导员（就是班主任）刘祖根老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开会，要我们各自介绍自己的情况。当时学校的管理是按照部队编制，即班叫排，小组叫班。我们是冶金系分化专业七五级二排，我们排有三十多个同学。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少说话，特别不要暴露自己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担任过什么职务，在学校里做最低调、最无人注意的人。

当我听完了同学们的自我介绍，才知道，自己在这批同学当中，年龄是最大的一个，年龄最小的同学比我小了整十岁（以前读书，在班上我都是最小的）。全排有五个带薪水的学员，我是其中工龄最长的一个。全排有八个党员，我们班（小组）有两个党员，其他全是团员。从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得知，他们分别来自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工厂，丢书本的时间都比我短，文化基础多数比我好，相比之下，一些来自农村的党员同学各方面都要差一点。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也有不少，特别是一些家境好的同学，他们见多识广，一个个都显得兴趣广泛，精明强干。有一个叫程永芳的同学是重庆建设机床厂的工人，我想这下可好了，以后放假回重庆有同学作伴了。

指导员叫大家准备节目，参加系里的联欢大会。这一下更加看出同学们的本事有多大了，吹拉弹唱什么样的能人都有，我告诫自己要装傻到底，不参加唱歌跳舞及任何的文体节目，有一个同学自己写诗自己朗诵，还有的自己作词、谱曲，创作歌颂“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歌曲。我还记得那个歌好听、好记、好唱，歌词大意是：“矿冶校园，歌声一片，迎来工农新学员，工农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曲子也谱得很优美动听。我们系、专

业和排里，各种人才济济一堂，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与他们比，相形见绌，完全不需要自己刻意地去装傻，相比之下，我本来就是傻乎乎的庸人一个。

在系里开的迎新生大会上，雷教导员强调我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我们不但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以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理论同文教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作斗争……话中还提到了不准谈恋爱的问题，强调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大家听党的话，不要违犯纪律。虽然大家都不是高中毕业进大学，多数年龄都偏大，再读几年书都有二十八、九岁了，但是，大家一定要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克服困难，安心学习……我当时真是十分老实，严守纪律，在学校后来有人追求我，把约会信放到我书包里，甚至当面向我表白，都被我婉拒了。

过了几天，雷教导员把我找去谈话，他说：“你是拿麻布口袋到学校来装知识的吗？”

我一听，吃了一惊，笑着说：“教导员，你怎么这样说我呀！”

教导员笑着说：“听接你的老师介绍你的情况，你与他们所介绍的那个黄荣华完全不一样啊！你一点不像他们所讲的那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你是重庆市的市革委会委员，造反派头头，在工厂又是厂一级的团干部，工作能力很强，还很能讲，怎么到了学校，你就变得哑口无言了？开了学那么多天，我都没有听到你说几句话哟！”

我说：“我学习基础差，丢掉书本的时间太长，年龄又太大，我是一只笨鸟，笨鸟要先飞嘛，所以……”

雷教导员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说：“社会工作还是要做的嘛！做社会工作也是你们学习的任务之一，你不要忘记了哟！你们这次上大学的任务，是‘上、管、改’，既要上大学，又要管理大学，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大学。你把你的团组织关系转到学校来，做一做团的工作嘛！”

我说：“我该退团了呢！”

他说：“你还是党支部大会都通过了的党员嘛！”

我说：“上级党委还没有批，因为有人说我包庇了贪污分子。”

他又叫我写信回厂，找组织部门说清事实，同时，他仍然希望我能站出来承担一些工作。我还是婉言拒绝了。

以后，指导员也说我是拿着麻布口袋来装知识的。其实我来上大学，除了学习知识以外，更主要的目的是要躲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折腾，我不想当那个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想当那个没办法正常开展工作的团支部书记……我想脱离政治，跳出一切是是非非的漩涡。如果我在学校里又站出来做团的工作，岂不是前功尽弃，又陷入到是非中去了吗？

正式上课前，我们首先要学习讨论文革的“十六条”及毛主席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我们先听领导的报告，再分排、班进行讨论。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要求，“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堂课，就是阶级斗争教育课，到长沙县“雷锋展览馆”去参观学习。我们这批学员是教育改革的产物，是别人的试验品。学校培养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又红又专，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学习期间，少不了要经常批判旧的教育制度，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每次开大会以后，都要在班上组织讨论，大家的发言都是千篇一律，应付而已。

来上大学，我已经做好了克服困难和吃尽苦头的思想准备。但是，才来不多久我就感觉到，困难不是我咬咬牙就能克服就能战胜得了的。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产物，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我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生，又有腰部和脚蹼的旧伤，怎么能与二十二三岁，又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的知识青年们相比呢！早操跑步，我常常是汗流浹背也跟不上晨跑的队伍。还有每月来例假的那几天，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上体育课，开运动会，对于我来说都是要命的极限。记得上体育课跳木马，我连跳了三次都没过，第一、第二次，我都是用手撑到木马上没敢跳，第三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跳，结果，一跳就跳到木马上面去坐起了，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

因为我们那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进校后，学校通过考核，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低分开上课，我们冶金系分化专业共六十多人，分成了甲乙丙三个班，我属中等水平，分在乙班，丙班是文化水平最差的，有十来个人。

学习很快进入了正常秩序，每个同学都有很高的学习积极性，学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不少同学在熄灯后，还在被窝里打起手电筒看书。系里在开会的时候，不得不在肯定同学们学习积极性的前提下，批评一些同学违犯作息制度的错误行为，是不可取的，休息不好，会影响学习……

当时的老师们都非常敬业。学校停课闹革命六年多了，他们好不容易才重新走上讲台，所以，他们都非常珍惜重上讲台的机会。对待我们这批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学员，他们煞费苦心，除了热情还非常有耐心，想方设法让同学们听懂学好，老师成天地围着学生们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在班上我是个带薪水的学员，有工资收入。但是，我却过得比谁都清苦，我还不好意思说出来。不带薪的同学每个月由学校按十九元生活费提供伙食，另外发六元零花钱。而我每月由家里寄来二十四元钱（相当于我工资的近三分之二），交一十九元生活费后，只剩下五元零花钱。在校四年，我连棉毛裤都舍不得花钱去买一条，学习北方女同学的样子，买那种幅面宽的床单布来自己做衬裤代替棉毛裤，扯六尺布就可以做两条，自己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制，这样省下几块钱。

第一学期，我还把吃不完的饭，放到窗台上晒干做成“阴米”，其他女同学也把吃不完的饭倒在我的窗台上晒起来，放假的时候，我就带回去给母亲做炒面吃。第一学期我们吃饭是吃桌席，八个人一桌，无法自己省钱，后来不吃桌席了，我每月都只花去十元左右伙食费，我就叫家里每月只寄二十二块钱给我。除了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外，我没有单独进过一次城。总之，我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了。

◇ 我所了解的工农兵学员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经历过许多的生活磨砺，所以都特别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同学之间相处也非常融洽，班上有什么活动，都会团结一致去完成任务。虽然当时满社会都在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那批学员中，没有什么你争我斗的事件发生，而是互相帮助，相亲相爱，至今我都还很怀念那段朴实真诚的同学生活。

在那个特殊年代，进了大学也并不像我所预想的那样，就进了世外桃源。政治运动仍然是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批了“活人”又去批“死人”，进校不久就是批“右倾回潮”，接着又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等……还有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批老师事件等等。学校还专门开了大会，组织大家讨论。但是，我们小组的同学发言并不踊跃。刘指导员在的时候，大家就读报纸，只要指导员一走，大家就转移话题聊天。

我从内心说，对张铁生的做法也是不太欣赏的，虽说我也是没有经过考试就上了大学。但我觉得张铁生第一次没有考好没有关系，第二年可以再考嘛！他没有必要在考卷上写那封多余的信，说一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话。我们也赞成进大学应该考试，可以免除一些弊端，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讲，如果要凭考试成绩进大学，我也上不了大学。但是，从整个大学的教育 GBK not allowed：质量来看，如果不考试，文化程度确实太差，进了大学也很难跟上学习进度。说老实话，我学习就很吃力，我读了半个学期中专，丢了书本十多年，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我下了好多功夫就不必说了，我们同学中分到丙班的学员就更糟糕，还听说有的连中学毕业的水平都不到，有的不知道正、负数，有的不认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听我们专业另外一个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有个党员在听读报的时候，听到“布尔什维克”一词，她问“布尔什维克”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样的基础，自然就学得非常吃力，老师教得也非常费力。如果不降低标准，他们根本就毕不了业。至于有的地方搞的“考教授”，我们更是反感，我的老乡雷老师，就公开对我表示她反对那种做法。她说：“隔行如隔山，我六二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化学，如果现在要考我其它的科目，我照样考不及格，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很赞成雷老师的说法。

对于张铁生，我们也有同情和支持，比如他要上农大，愿意读书以后再回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也觉得他很高尚。有多少人跳出了农村又愿意再回到那里去呢？所以我们也赞成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理想服务农村。

当时的宣传也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鼓动作用的，比如我们专业另一个排有个叫冯向可的同学（河南人），他发出倡议：“要与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决定毕业后回乡去当农民。”学校组织我们讨论他的先进事迹，所有同学都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可是没有任何人响应他的倡议，愿意大学毕业后回到农村去当个农民。学校对他的“壮举”还是很重视的，将他树立成全校的典型，还专门为他准备了毕业实习的课题“分析腐植土”等。后来听说他在农业局工作，没有去当农民。

对于小学生黄帅的宣传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在闲聊时，隐晦地表示有点荒诞无稽。我们对黄帅的看法与对张铁生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们班上没一人公开表示支持黄帅的。有的人说：“是否家长在背后支持她的行动？一个小学的孩子，不该会有那样的想法……况且她同老师对着干能学到什么？瞎胡闹。”

我们的同学中，基础好的和比较好的还是有很多的，并不像有些人编排的笑话那样一无是处。还有，我们这批人的特点，就是刻苦认真，那种精神也是不可小觑的。客观地讲，任何一届大学生都有好的和比较差的。我的同学中也有通过努力得到升华出成果的，有出国的，有考上研究生的，有当处长、部长、书记的，有在中国科学院做出成绩的，就是在工厂的很多人，也是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

◇ 第一个暑假

七月下旬，我们终于放暑假了。“归心似箭”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感觉远远超过以前从北京学习班回家那分急切。那时长沙没有直达重庆的列车，得先乘车到株洲，再转乘上海去重庆的过路车。那班火车要两天才有一趟（上海出发，一天到重庆，一天到昆明），加上学生都放暑假了，所以特别拥挤。我们回重庆坐火车从来都没有坐到过位子，常常是挤在过道上，一呆就是两天两夜。如果运气好，能在中途坐到有人下车后空出来的座位，不过那种好事我没有遇到过。过去从北京学习班回重庆，还有一大群熟人，相互照顾。而从长沙回重庆，只有两三个重庆的同学。我们在过道上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有时刚坐

下，就得起身让别人或售货的小车过路。过道离厕所很近，天又热，开始时闻到臭气还难受，时间久了就麻木了……就这样艰难地熬到重庆。

到家后，妹妹也已经从农村回到家中等着我了。当知青的妹妹给我讲了许多农村的事情，她在农村表现很好，还当了团支部书记，与贫下中农和知青都相处得也很好，我很放心她。

一天我到厂会计科去报销探亲路费。会计告诉我，读书的人回家，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只能报销一次路费，还拿了中央的红头文件给我看。我回到家里给妈妈讲了这个情况，我说：春节我就不回家了，假期太短，来回要花掉五十块钱的路费太不划算。我和母亲商定后，以后的两年春节我都没有回家。

时间好像走得特别快。一个多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我叫母亲去找邻居借了八月的煤炭票，我提前把下个月的煤买好挑回家来，和妹妹一起把煤球捏好，我把米也给妈妈买好了。

离别的时刻说到就到。火车票已经买好多时了，重庆到上海的直快车，傍晚六点启程，两天两夜到株洲，还需要在株洲转车到长沙。

就在要出发的那天，我却突然发起烧来了。我想到医院拿点药吃，医生却说要我打吊针。我拒绝了，因为时间来不及，我要求只打退烧针，再给点吃的药就行了。医生再三告诫我说：“小孩烧到三十九点五度问题不大，大人就不一样了哦！容易烧成肺炎……”我还是坚持要走。一来，那趟车要两天才有一班，我晚走两天就会迟到；二来，退票要交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这两样都是我不能够接受的。在我的坚持下，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针，拿了一点药。我强打起精神，满脸通红，走路都有些不稳当，歪歪斜斜地走了。我坚持不要母亲和妹妹送我，自己快步走到河边的轮渡船上等待过江。

一上火车，我就坚持不住了，趴在那个小小的桌子上，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怎么熬过那两天两夜的，我都不记得了……

◇ 我为什么给江青写信

我按时回到了学校，还留了一天时间整理内务。当时我的感觉是，回到学校才算是回家，而回到重庆久别的家里，却像是一次短暂的做客。

紧张的学习又开始了。这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学习贯彻中共“十大”精神。在我们放暑假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学校开学后，就安排传达和学习讨论“十大”文件，在学习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十大”上作了政治报告，说“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在“九大”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说林彪在党内经营了几十年，而毛主席早就对他进行过严肃的耐心的教育……这些话听起来总有点不能自圆其说，让人感到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的味道，还有王洪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新党章删去了总纲中称颂林彪的那几句话，但是，仍然重申“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句话是我最不想听到的。我决心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管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都不去管，不发言，不批判，上面开大会，我在下面背英语单词，记数学公式，物理定理，配化学反应方程式……我不会把精力再用到那些整人理论上去。我要把心思都用到学习有用的文化科技知识上面去。

一九七三年的一天，雷教导员找我，问我的组织问题打算怎样解决。我说：“耐心等待吧！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主动权又不在我这里。”他说：“要是厂里不批，你可以在学校重新写入党申请书嘛！”我说：“到时候，学校还不是要我说清楚，包庇贪污犯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是只有那一句话：你们调查嘛！”

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还可以在学校重新申请入党。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在学校申请入党为好，因为那样做，我必须要在学校有积极的表现，要表现就会违背我“装傻”的计划，必然会影响到我的学习。

我按照雷教导员的意思，给厂党委贺代表（军代表）去了一封信。汇报我的学习情况，同时重申：对杨明芳所谓“贪污”的问题，我在厂里说得很清楚了，没有遗漏。对军代表提示的一些内容，我确实不知道，不能进行揭发。厂党委秘书林玉洪代表党委给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要我好好地学习，耐心地等待调查结果，相信党组织能够把问题搞清楚。

教导员又一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学校重新申请入党。

我本打算不再去纠缠入党之事，安心学习。雷教导员的话又勾起了我的回忆，越想越不通，我的自愿入党申请，在支部大会上全体党员都举手通过了，上级党委就因为一个捕风捉影的所谓“包庇贪污分子”的问题，一直拖着不批准我入党，而这个问题已经调查一年多，也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贪污证据。

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福建省莆田县李庆霖老师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毛主席给李老师回了信，还寄去了钱，批评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制定了解决知青生活问题的新政策。李老师不但解决了自己家的问题，还帮助数以万计的知青争取到了改善生活条件的政策。我一时心血来潮，竟异想天开地决定学习李庆霖老师给毛主席写封信，讲述自己所遭遇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证明有个别支左的军队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

信写好了，我又觉得，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为了自己个人的这点小事情去打扰他老人家不太妥当。于是就想把信写给江青，让她转交给毛主席。我很幼稚，想得很简单，以为毛主席的家庭，也跟我们老百姓一样，下班后一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工作之余一起休息、聊天。江青可以在毛主席空闲时转交我的信，或者转述一下我信的大致内容，毛主席不是还看红卫兵编印的小报吗？

这封信到底寄到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时间一长，我都把它给忘掉了。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在“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时期里，这封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被转到了我们厂里，这次它却成了别有用心的整我的“钢鞭材料”，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精心编织、演绎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童话故事，说我是江青的干女儿，写信向江青要什么什么等等……

◇ 学员中盛传手抄本与小道消息

在我记忆中，一九七三年以后，要我们学习的批判文章越来越多。许多东西都被批判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却得到了称颂、赞扬。过去被认为是最坏的事，现在却说是做得好，我不明白这是不是颠倒是非。还有批判孔子，我从小就知道孔子是“孔圣人”，现在却变成了“孔老二”，是最坏最坏的人。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是山东人，学习讨论时按报纸上的说法批判孔子，下来闲谈中提起孔子却都崇拜得很，说他们那里，直到文革期间，学生发蒙、升学，都要悄悄拜孔子。

好在我们后两年的大学生活，实习机会比较多，一般都是离开学校去外单位实习，如株洲硬质合金厂一月，湖南省地质局实验室一月，毕业设计又在水口山矿务局整整三个月……实习对于我来说，才真的有点像置身于世外桃源，因为在实习单位，可以不看那些批判文章，不写那些批判稿，不参加那些批判会，也可以坐在那里不发言。

当时，我们同学中也传播着许多的小道消息，有关于江青的，还有关于其他一些中央首长的。还有人争相传看手抄本小说，如当时被查禁的所谓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等，还有算命的书。还盛行讲鬼故事。故事我听了一些，书我一本也没有看，因为我不想把精力用到学习以外的地方去。

◇ 难熬的寒假春节

一九七四年放寒假时，我们班上不带薪水的学员都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下我和建设厂那个带薪学员小程没有回家（因政策规定，一年只能报销一次路费），整栋宿舍人去楼空，格外冷清寂寞。寒假包括春节，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我们没回家的人来说却是很漫长很难熬的。开始几天图书馆还开放，我们还可以到图书馆看书。后来图书馆也放假了，学生食堂也关门了，我们只能到离宿舍较远的教工食堂去打饭吃。

到一九七五年的寒假，小程决定要回家过年去了。她对我说：“不报路费就算了，就当我们不带工资，报不了路费，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辛苦了。”我苦笑着说：“不行，我妈没有喊我回去，算了吧！不就是最后一个春节了吗？”她不知道我家经济的艰难。为了不让母亲为难，我还是坚持再熬一个冷清艰苦的春节。

那一年的寒假，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没回家。春节那几天，整栋楼房就只剩我一个人，那日子的艰辛难熬可想而知。开始我还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我到图书馆去借了几本小说，准备在假期里借以消磨时间。我又到街上买了一把干面，准备春节食堂放假不开伙的时候，自己煮面条吃，我还特地买了一角钱的榨菜皮子。准备春节期间尽量少出门或不出门，我害怕碰到老师，更害怕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玩，特别怕请我上他们家去吃饭。已有湖南本地的同学邀请我去她们家玩，我都婉言谢绝了。

春节时长沙非常冷，跟重庆一样，室内没有暖气，有时还会下雪，比重庆的气温更低一些。春节虽只有几天，对于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们女生宿舍在校园的最深处，是离岳麓山最近的一幢房子。平时就很幽静，很适合读书，但是在春节，唯有我独自一人之时，这幽静就变成了神秘，变成了恐怖。除了打开水以外，我根本不愿意出门，平常也很少出门，每天吃两餐，顿顿是清水煮面条……

寒夜孤灯，独自一人坐在四层高楼的女生宿舍里面……缺吃少穿的艰难困苦我早就习以为常，都能够忍受，唯独母亲我放心不下。妈妈一定会思念千里之外的两个女儿……想着想着，我泪流满面，伤心至极，内心里充满了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解与怨恨。据我所知，一九五四年以前进厂的工人，一年转正，第二年就定二级，第三年拿三级，第四年拿四级……可是现在，毛主席发动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全国生产停滞不前，我工作了十多年都不加工资，我本想等到拿了四级工资就结婚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我的疾苦吗？……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害苦了好多人，无辜死亡了好多人，现在还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真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

就要开学了，同学们陆续返回学校。我总算熬过了孤独冷清的传统佳节，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下旬，我的大学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带薪学习的学员不需要学校分配，一律回原单位。

□ 原载《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10月

~~~~~

## 【不堪回首】

### 干校琐忆

• 牛 汉 •

1969年9月29日下干校前，连队集合走到天安门宣誓。我们出版社一个连队一百多人。上火车后我坐在韦君宜旁边。她木呆呆的，雪峰等都在同一列火车上。

到咸宁下车后，冯雪峰赤脚自己挑自己的行李。地十分泥泞，我问雪峰行吗？他说“行，行”，他说从小走惯泥泞的路。冯雪峰农村长大的，走路很稳。后来，他在一个水塘边看水泵，为菜地浇水，我天天挑粪，浇菜地。我在水泵房前看见雪峰，悲苦、坚忍、正直，活像被劈了一半的半棵树。1972年我写的短诗《半棵树》就是写当时的感受。

在王家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我们住原地主的房子，两层，门前有水池子。雪峰在水池那一边。一人一床，几个人一间房。后来自己脱坯准备盖房子，盖好了就搬到自己盖的干打垒房子住。最近在美国逝世的原外文编辑部的高骏千，大家喊他“高架子”，他是盖房时的架子工。我和泥、脱坯，干最重的活儿。干活我不含糊，很积极。盖的房子是个四合院，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四合院外边，有两排平房，住过几家中国作协的人，其中有张天翼和侯金镜两家。

接着围湖造田。沼泽里很多蚂蟥，不少人被咬了。

由于围湖造田，到1970年的夏天向阳湖已经成为没有水的湖，像一口烧干了的热锅。湖底白天热到摄氏五十多度，室内温度也达到了42℃以上。最热的那一阵子，我多在“湖”里水田干重活：挑秧、送饭。每周至少还去咸宁县城用平板车拉一趟菜。我如一头牲口，双手把着车把驾辕，有两个同类（五类分子）拉梢，每车负重不下千斤。烈日当头，弓着赤裸的背，还得昂起头看路。遇到瓢泼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来回就须跋涉六个钟头。

有一个管伙食的革命群众负责采购，他（我不愿亮他的名）可是个真正的甩手大爷，空着双手押着我们，从来不帮着扶一下，这就是当时深入人心的“阶级关系”，是绝不可模糊的。但苦难使我也懂得了其中的虚伪和奥妙。押着我们的这位大爷，由于始终独行，闷得慌，想跟我们说说话。我绝不搭腔。有一回，他无理呵斥我们，我差点挥拳揍了他。但拉菜也有个好处，去时是空车，可观山望景，有时故意放慢步子，回返时可以挨近黄昏，天气凉爽些。人毕竟比牲口有点头脑。

有一天下午，从城里拉肉回到连队宿舍，听说社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刘敏儒死了。当天早上，我打早饭时还碰见他，他端着一瓷盆粥。我见他两只眼血红血红，跟他说：“你得到医务室看看，不要大意。”

他说：“我的眼睛过去就老出血，不碍事。”他说话时直发喘，当时我就觉得他病得不轻。可是他仍然挺着，不敢开口请假。记得他是分到菜地干活，在山坡上开荒，活儿并不轻松，需到山坡下的水塘里上上下下地挑水，我干过几天。刘敏儒是脑溢血，在菜地里晕倒的，抬到工棚里，只一会儿就死了。死得很惨，眼睛、鼻子、嘴巴里都流着血。

下干校前，刘敏儒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秘书，为人厚道，工作谨慎，很称职。他的毛笔字写得很规矩。听说，他曾在冀东解放区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到了国统区。文革时，被诬为两面村长。这个历史包袱，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在干校跟我不是一个排，没有一块儿劳动过。他的体态偏胖，面色白里透红，着实像个有福气的“老村长”。

在干校，他远不如老鬼孟超活得开心。孟超，当过人文社副总编，人虽精瘦精瘦，可成天咧着大嘴巴，笑嘻嘻的，叼着烟卷儿，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既可怜，又可笑。军宣队的人说他干活偷懒，一个钟头大小便三五回。孟超说，他有病，天天尿裤子！“不信，来摸摸裤裆！”他又开腿，“谁来摸？”我见过他这样表演过几回。我真的去摸了一下，对军宣队的人说：“是湿嘟嘟的。”孟超后来很感谢我为他作证。刘敏儒干活肯定认真，从不敢偷奸耍滑，他远不如孟超鬼。那几天，天气酷热，尸体不能久留，得赶紧埋掉。连队为他赶制了棺木。当时盖房时搭脚手架用的木板，有的是从北京故宫运来的，板子又厚又沉，是盖金銮殿用过的。都说刘敏儒的冥福不浅，寿木规格可真够高的。一吃完午饭，连领导指派我和丁玉坤几个人去挖墓穴。

坟地的风水很好：清静的小山窝，五六株亭亭如盖的松树，还面临一个清幽幽的水塘。丁玉坤在故宫干过事，比知识分子懂事些，说一定得把老刘的地宫挖得讲究些，多深多长多宽都有规矩，挖了起码两三个钟头。在刘敏儒之前，已经有一位“五七战士”在这里入土为安了。这位死者，可不是一般的小辈，他叫石宝常，是出版口的资深编辑，民国初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过。巧的是，他和刘敏儒都是冀东人。我们几个在挖坑之前，先把这位石老前辈的墓冢修整了一番，填了几个耗子洞。老丁说：“填了也不行，窝在里面。”

晚饭后，接到命令，还是我们几个“分子”为刘敏儒抬棺安葬。连队的大部分人默默地为老刘送行。盖棺前，大家一一向老刘告别，有人在呜咽，记得是潘漪。刘敏儒满脸斑斑血迹，我用手帕为他擦掉，血尚未凝固。他的近视眼镜掉在身下，我拾起来端端正正地给他戴好。他的身躯下面垫着一条绿毛军毡，是社里当代文学编辑室、曾在青年军干过的朱叔和的。我对朱说：“一块埋了？”老朱点点头，说：“让老刘在地下温暖点。”声音很悲痛。老朱也可能是抬棺者之一，记不清了，他也是造反派死揪活揪的一个什么分子。盖好棺，我们就抬起上路，很沉很沉。有不少人跟着送葬。刘敏儒和石宝常并排地安葬在一起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为死者抬棺安葬。那种沉重感，不仅压在肩头，还沉沉地压在心上。

对于各种劳动，包括重体力劳动，我从不叫苦，什么活儿我全能干。才到时自己没有种菜，起码我们一周要到县城两次，拉菜、肉、油等生活必需品。还到四五里外公社的粮库拉过粮食，总是我驾辕。干重活时我到县城吃一顿饺子。有一次同去的还有萧乾。他年老体弱

走不动。去时是空车，可以慢悠悠地走，回来车装满了东西，很沉，足有千斤重。冬天身上毛衣都湿透了。

有一年夏天，我的前胸和后背被烈日烤爆了皮。一个聪明的好事者竟从我的脊背上痒酥酥地撕下一大片死皮，有五寸见方，色泽赤红赤红，天天被汗水浸透的毛孔历历可见，举在阳光下照照，还清楚地看见几道发暗的条纹，那是拉平板车时被绳索勒的痕迹。我把这张发着汗血味的自己的皮，夹在心爱的《洛尔迦诗钞》里。诗集本子太小，洛尔迦和他的诗都救护不了我的皮，没几天就折碎了。如果我的这张皮能上能下后来还在，我一定要在上面写一首诗，装在镜框里，悬挂在我居室的墙上。那的确是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运的图像。

1970年下半年，一批老弱病残，包括冯雪峰、金人、林辰等等，连家属二三十人到丹江口去了。金人还不愿走，直流泪，尽管到那边劳动较少。

日子过得比在北京时简单。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想法，但不交流。《人民日报》干部寿孝鹤因我的牵连弄到西藏去了。（文革中，《人民日报》造反派把他当做审查对象。）写了两次寿孝鹤的材料。头一回比较严厉，第二回比较平和一些。我证明1944年冬天他在西安帮助过我，他也是真理卫队创始人之一，1946年7月在开封我介绍他入党。

我们和五连中国作协的连队挨着。盖好房子，我拉车进城时张天翼托我买奶粉之类的东西。一次见他在屋外头站着吃饭，高个，瘦，老婆跟他关系不好。看他一脸苦相，很可怜。不知为什么站在外面泥地里吃饭。还为另外三四个人代买过东西，悄悄地买，不能让看见。

五连（中国作协）侯金镜光膀子喂猪，活活累死了！躺在一个小棺材里，在朱家湾一间民房里放了一天。我平时跟他没有说过话，但还是去向他告别，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听见有人唱战争年代的歌，唱歌的就是侯金镜的老婆，听了让人心里惨痛不已。后来我悄悄写了一首诗：《我去的那个地方》。诗中有这样两句：“我去的那个地方 / 有人在星光下正唱战争年代的歌。”

全连还有一百多人，每班十多个人。大约是70年代初，文洁若与萧乾去庐山一个星期，她家养的猫饿得喵喵叫，我可怜它，每天都去喂它一盆吃的。文洁若回来后感激我，吃早饭时就给了我半勺肉松。

在干校，我养了一只狗，叫小白。那几年，我与小白的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胜过了人。它的妈妈，我们喊做“老白”，被我们连的一个老干部偷偷地杀了，不为吃肉，为的是一张狗皮。死去的老狗留下一窝狗崽，我挑了一个养起来。我把它从小养大，取名“小白”。后来，连队撤销，我们“一小撮”分子集中到452高地，我把小白带去了。它已长成，十分壮大，毛色雪白雪白。它白天到处玩，晚上必定回到我这里，卧在门口。

我每次到武汉去探亲，小白都会送我，一直送到西河渡口。我上了渡船，它静静地蹲在河对岸，目送我远去。三五日后，我深夜归来，它一望到我的身影，就会吼叫着，迎上来。它怎么晓得我正好在那个时辰回来？真是一个谜。有一回我梦游，半夜出走，在湖边走到天亮，小白也一直陪着我。

一日，我从城里挑鱼回来，有人告诉我：“赶紧去救你的小白。”我问：“怎么啦？”他说：“毛毛他爹正在宰它。”我火冒三丈，赶紧去救小白。毛毛是另外一个连的小青年。他爹是50年代初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为人很诚恳，我不明白他怎么竟敢下此毒手。我找

到小白时，毛毛他爹正往小白鼻子里灌水。杀狗，血流尽了，肉便不嫩。就在这一瞬间，我赶到了，大吼一声：“住手！”

毛毛爹知道我的脾气，赶紧过来向我解释：“听说咱们不久要回去，咱们走了，当地人肯定要把它宰了，还不如由我们享受好。”我听不入耳，赶忙操起一把镰刀，把绳子割断。小白咚地一声掉在地上，它已气息奄奄。我再晚来一步，它就会被活活憋死了。小白睁开眼睛，茫然地对我看看，似乎并不认识我这个亲人。几秒钟后，它清醒过来，并没有扑过来向我感恩，而是疯狂一般蹦起来，一溜烟朝山下面跑掉了。小白在生死关头明白过来：对于人，可不能轻易相信。

小白离开“4 5 2”后，又回到了四合院，也就是我们到干校后修建起来的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的地方。一天，我回四合院时突然见一只狗扑过来。它并没有扑到我的身上，而是蹲在我的面前，两只前爪死劲地挠着地，两眼盯着我。我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养过两三年的小白吗？我流出了眼泪，真想不到小白一下子认出了我。我一直为它的命运担忧，看见它，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干校，政治批判活动并没有停止。揪“五一六”之前，有一天批冯雪峰，时间是晚上，在露天空场上。社里外文编辑部的程代熙真可怕，慷慨激昂，没完没了，说得很长。具体说什么忘了，记得的是雪峰本来在前面坐着，他断喝一声：“站起来！”雪峰就站了起来。

舒芜写大字报，很长，贴在院墙上，揭发批判胡风。绿原写了检讨。我没有写。我在干校一篇大字报都没有写过。

从1970年春天开始，揪“五一六”成了运动重点。何启治从连部秘书变成被审查对象。他原来写过《韶山的路》（诗），我还悄悄鼓励过他几句。现在要在全连大会上交代了。他被迫承认参加所谓“五一六”的检讨，一听就是胡说八道，他乱编，却说得跟真的一样。全是假的，我们老家伙知道。

下来之前，在出版社两派辩论时，程代熙为团长的“革命造反团”说你们（按：指何启治所在群众组织）包庇牛鬼蛇神，包庇牛汉这些“胡风反革命分子”。社里现代文学编辑室的王一之（王向彤）就大声说：“‘胡风分子’也有好的，牛汉就是好的‘胡风分子’。”他好幼稚呵！

从1972年起，陆续有大学等单位来挑人。武汉、广西都来挑人，王一之就是这时走的，但后来回到北京的还是多数。1973年之后，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单位，或调往别处，只剩下“一小撮”仍滞留在4 5 2高地——干校校部所在地。

大批人走后，文化部干校的人马全部集中到校部——4 5 2高地。此时应是1973年秋冬。所有滞留文化部干校的也就剩百把十来人。因林彪问题，郭小川第二次被迫来干校，那已是深秋，他还穿着邋遢的衬衣，瑟缩发抖，流着清鼻涕，挺可怜的样子。我心想，“活该！”都知道林彪老婆叶群日记里有“文艺问题找郭小川”的话。我们都不敢与他接近说话。

郭小川跟我一个班劳动，每天上午干一个多小时，很轻松。他头脑昏昏，因为夜里喝酒，吃过安眠药。开小组会时，《文艺报》的有些人故意引他说些昏话，引得大家发笑。他常常平伸开手掌向我讨要茶叶，我有新的“麻绿”（湖北麻城产的绿茶）。我与他渐渐谈得

亲近了些。他一再向我说：“我不懂政治！”我理解他，经过这些年的教训，他醒悟了，对人生，对政治，对自己，有了新的较清醒的认识。

1973年6月，我们没有大的劳动任务，只种点菜，没人管，几个干部，还有张天翼老婆，绿原……

我们，我和舒芜，还有缠着要我们带她走的十三四岁的卢小冰（人民出版社的卢敏、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前主任陆耿圣之女）。放一周假，我们三个人，打着到韶山瞻仰的名义，实际上坐火从武汉一路到了桂林，游了两三天漓江。《华南虎》就是在桂林起草的。到阳朔还待了一天。回来说韶山好，深受教育。瞎说呵！

阳朔倒影真漂亮。在漓江船上，舒芜咏了一首古诗。他的解释太书生气。我说那是写山的倒影，当然会晃动。

舒芜家学渊源很深。他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芜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东字写得很好，在河北当过县太爷。他离任走时雇书童挑书，一担书，怎么会这么沉？原来书页中夹了一片片金叶子。（这个桐城流传的故事是我老伴吴平说的，他们方家的孩子在吴家的私塾寄读。）

1974年，一个牧童来找我，说：“你们的那两个坟墓塌陷了，赶紧去整一整吧，不然，棺材板就被人拿走了。”这牧童是王六嘴的。有一回，他偷掰我们连队的玉米棒子，让我碰见了，我没有骂他，只对着他傻笑。我想起小时，我也不知偷过多少回财主家的玉米。

我见他生吃，说：“烧着吃更香。”于是我俩在地上拢起一堆火，烤得喷喷香地吃。我对他说：“咱们只吃这一回。”后来，我跟这个牧童建立了感情！他送过我一回鳊鱼，做熟的。

我跟同连队的马毅民当下扛着锹去修坟。刘敏儒和石宝常的坟果然已经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了。

不幸的是，这一年王六嘴的那个牧童，突然得急病离开了人世。他只活了十几岁，是村里的一个孤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给过我友情的少年。

在干校的后期，有时候会去洗温泉。离咸宁县城二十多里确实有温泉。坐公共汽车去，在那儿吃饭。躺在流动的温泉中。冬天，温热的流水，在赤裸的身体下咕嘟咕嘟响，真是享受。

1974年12月末，我总算结束了干校的生涯。先在武汉住了两天，然后回到北京，历时五年零三个月。我们走之前，郭小川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负责押送的是《诗刊》的丁力和尹一之。他俩都不搭理郭小川。郭小川喝很多酒，又吃安眠药。他的行李捆得太松，难以上路。我重新帮他打好行李包，帮他扛着装上车。临走我说：“北京见面！”他说“不行”，就被押送到团泊洼，经过北京都不让下车。

吴雪也是最后走的。现在听说吴雪老年痴呆了。我们曾在干校附近的大水坑里一块游泳。大水坑里的水很清，不臭，在离大湖不远的地方。

臧克家说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小天堂，是圣地。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 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  
【研究述评】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二）

• 杨 隽 •

（上接 z k 2 0 0 7 a）

2、中国老红卫兵研究评述（41）

“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学却在外国。”（42）这句话虽令人不快，却基本是事实。不管是官方的文革研究，还是民间（43）的文革研究，都要晚于西方。而官方政策相对宽松的十多年中，即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后的十数年里，（44）主流的文革研究被圈定在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45）所划定的范畴之中。尽管这段时期对文革研究定下的条条框框是最少的，但民间文革研究没有形成气候，国外文革研究的成果对国内主流也无多少影响力。自然，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被束缚在主流叙事之中，老红卫兵研究则更不能“幸免”，谈不上什么独立的研究成果，只不过是时事政策的附庸，提供一些史料。而相对宽松期结束之后，官方政策收紧，主流的文革研究基本停止。

这段时间主流的红卫兵运动研究有着两个大问题：1，将红卫兵运动看成一个整体，“分派”或者说“派性”问题基本不予提及，这既符合《历史问题决议》中“‘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精神，也迎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引入的将“群众运动”视为“乌合之众”的思潮；2，与前一点紧密相连，故意忽略形成“造反派”红卫兵的“文革五十天”历史，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以上两点结合就扭曲了整个历史的图景，并形成了一套主流的历史叙事。其中最典型的两篇（46）就是苏采青在1987年内部发表的《红卫兵运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47）和署名何为（48）的发表于1986年的美国《知识分子》杂志上的《老“红卫兵”叙评》（49）一文。虽然这两篇文章作者立场或许不完全一致，所针对的读者群也不相同，然而其叙事模式却基本一致。在苏采青一文中，红卫兵运动是一个有着“起承转合”不同阶段的有机整体，在某些人的“反革命阴谋”策划下，红卫兵运动最终误入歧途打倒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叙事模式下，红卫兵运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老红卫兵运动，而为了掩盖叙事和历史的极大不同，甚至不得不曲解“老红卫兵”一词的本意，只将其作为区别于后来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基本不顾老红卫兵与后来红卫兵的巨大不同。何为一文则更是如此，尽管标题提及了老红卫兵，但是在正文中竟然根本未提及老红卫兵，基本上是按照“红卫兵运动就是老红卫兵运动”的模式进行叙事。当然，这段时间的研究也并非毫无收获，至少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50）以及研究的起点，比如南开大学的江沛就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以红卫兵运动为主题的研究性著作——《红卫兵狂飙》，（51）尽管是官方观点的再重复，但总还是提供了不少史料和研究的起点。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官方的政策日益收紧，主流对红卫兵的研究已经停止，体制内不再有新的著作面世，只有零星的文章面世，（52）而在体制外继续积累老红卫兵材料出版著作的则是原师大一附中的学生米鹤都，他的十本关于红卫兵运动（主要是老红卫兵）的专著（53）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不过，由于主流话语的影响，对这些材料还需要做进一步仔细的考辨。

主流研究的停滞并不意味着民间研究也跟着停顿了。事实上，一直以来还存在着一套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文革解释和研究体系，这套体系并不与主流观点完全对立，但却始终保持独立，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主流还能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十多年中，民间文革观点影响甚微，主要是两个人打下基础。一位是刘国凯，一位是王希哲。刘国凯是广州的造反派成员，王希哲则是大名鼎鼎的“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早在1971年年底刘国凯就写成了《文化革命简析》并油印成小册子在朋友之中传播。1980年刘国凯将其修改之后再次发表在民办刊物上，〔54〕后收入台湾所编的《大陆地下刊物汇编》之中。同年，王希哲也在民办刊物上发表了题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稍后刊发在香港的出版物上。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刘国凯的视角迥异于官方，他认为“尽管高级领导阶层的某些内部动作对文革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社会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表现并不一定都以此为转移，而且，当那些内部动作一旦影响于社会时，便也就以某些社会事件表现出来，使我们平民百姓亦可观察了解到了。”〔55〕正是因为从社会这个视角出发，刘把主要的笔墨都放在了“群众为什么参与文革？及如何参与文革？”这两个问题上，对群众中的分派也做出了从今日来看都较为深入的探讨，比如他以为“文化革命中两派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归纳起来有两个因素。一是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二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从而造成愈来愈严重的互相复仇攻杀。前一个因素是事情的本质，它决定了矛盾难以调和。后一个因素是事情的量，它使矛盾斗争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56〕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不同派系，刘国凯更是洞若观火，他称那些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即老红卫兵）〔57〕叫作“红五类”红卫兵，称那些后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为“革命派”红卫兵。〔58〕他指出早期的这些“红五类”红卫兵“大都是高、军干子弟，他们组织‘红卫兵’并非出于成熟的政治目的，仅仅是一种政治狂热和政治优越感的表现。”〔59〕秉承的是“血统论”的原则，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破四旧”之类。可以说刘的这些观点与西方的社会冲突论是不谋而合，〔60〕甚至在文革时限的划分上刘跟社会冲突论者也一模一样。〔61〕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刘只把六六年到六九年视为“文革时期”。可以说刘国凯是中国从社会角度分析研究文革的第一人。

如果说刘国凯是专注于社会，那么王希哲则是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文革前毛泽东和体制的矛盾，毛泽东和社会的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及毛泽东在文革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在最后的结论（也就是后记）部分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他说：“那么，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又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这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于是：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西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62〕

2006年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王希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当初的“人民文革”概念。〔63〕在《也论人民文革》一文中，王说“人民文革，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异化，产生和发展起来与之对立的为争取和维护人民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运动。它的延续，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和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64〕而在《“人民文革”简要问答》一文中，王对“人民文革”的定义则是，“作为毛泽东文革的反面，一切文革中自觉的不自觉的（或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人民反毛，反官僚集团，反中央文革，旨

在维护自己或自己阶级政治经济人身权利和利益的反叛运动，我称之为‘人民文革’。”

〔65〕综合1980年和2006年王希哲对“人民文革”的定义，可以看出两个很重要的点：1，与毛泽东相对，凡是反对毛泽东的，就可以被纳入“人民文革”的概念，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为什么王希哲后来称“联动”为造反派的原因。社会矛盾则指的是人民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2，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民间的民主运动诉求相连，为民主运动寻找历史渊源和合法性。故而，王的“人民文革”的概念是和十年文革的分期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王是十年文革下的“人民文革”。尽管王的“人民文革”论看起来和刘国凯的社会冲突论很相似，都强调“社会矛盾”，然而这两个概念有相当大的区别。刘国凯的社会冲突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而王希哲却认为“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人民群众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66〕换言之，王希哲不认为1966年下半年的反“资反路线”是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国凯和王希哲都透露出厌恶毛泽东，“告别革命”之意，对当时中国时局的变化抱有很大的期望，这些倒和主流不谋而合，跟现今对毛泽东普遍抱有好感的左翼是不一样的。以后的民间文革研究正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进入九十年代，因为九零年前一年的政治形势，大批民间人士出走海外，在新的环境中，少了旧的束缚又急于建立新的解释体系。这些人士中的一些前造反派成员将王希哲的“人民文革”与刘国凯的“社会冲突”结合起来：取王希哲之名，采刘国凯之实。最终形成了今日广为所知的“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67〕这一观点大大推动了民间文革的研究，触发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是“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是“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68〕“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最著名的两位代表人物〔69〕是著名作家原清华附中的造反派郑义（原名郑光召）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原湖南长沙地区文革时的“极左”派成员杨小凯（原名杨曦光）。

最早提出“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是郑义。据笔者所查，他最早见诸大众的文字〔70〕是1992年发表于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关于‘两个文革’的思想，数年前我就在文章中明确表述过……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政治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和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71〕稍后，郑义在写于1989年出版于1993年的《历史的一部分——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中再次重复了这段话，仅仅修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符号。〔72〕同年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中，他对这段话做出了修改，修改后的版本是：“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反抗暴政却是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最根本动因。”〔73〕很显然，修改后的“三年人民文革”在意义上被提升为了“民主斗争”，将原先为一整体的文革运动分裂开来。或许是觉得这个定义还不够准确清楚，有过分拔高之嫌，在1996年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郑义撰写专文讨论“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并发表于美国的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上。在此文中，郑义又一次对两个文革论进行了修改，将“人民的文革”的定义改为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74〕此后，郑义基本坚持了这个定义，尽管在众多的批评之下有所调整，但没有放弃“三年人民文革论”。〔75〕

虽然杨小凯并未提出“三年人民文革论”，而是提出了造反派准政党论，但是杨小凯的意涵与郑义是相同的，也被人们一般认作“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提出者。杨小凯首先化名习

广〔76〕于1986年（即文革爆发二十周年）在美国的《知识分子》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77〕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杨小凯认为1966年9月以后毛泽东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大打民意牌，并且默许群众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准政党活动，而群众，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党内受到压制的派系则抓住这个机会，尽可能地找回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受剥夺和压制的权利，并最终导致了1968年的“极左思潮”。

这篇文章已有“准政党论”的雏形。进入九十年代，1990年8月杨小凯又在香港和海外的杂志上提出“文革应该被视为社会矛盾的体现，而非一场精英的权力之争”〔78〕的观点。其后，又先后在海外杂志上刊发了《再谈“文革”》《再谈造反派》《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等文章，并以《狱中回忆》为名连载自己的文革回忆录，即大名鼎鼎的《牛鬼蛇神录》。〔79〕在这些文章中，杨小凯再一次声明“文革不是一个整体”“毛泽东和群众有结盟的关系”“造反派是因为反对政治压迫而起”等观点。到1997年，杨小凯将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正式提出了造反派准政党政治实验的观点，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控制下的准政党政治试验》〔80〕一文中，他采纳了“三年文革”之说，认为从十六条开始，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调整策略，默许共产党之外的群众性自发组织成立，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份以后又默许跨行业跨地区性的准政党组织成立，这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人群利益的政治诉求”，类似于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政党，而不是共产党式的革命党。但是因为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及游戏规则，这场准政党实验很快就陷于派性斗争而失败。很明显，杨小凯的造反派准政党论是“三年人民文革论”的一个变种。

除了郑义和杨小凯，具有华人背景的西方学者陈佩华也持“三年人民文革论”的观点，她在《摒除对红卫兵运动的歧见——重新检讨文革派性根源和文革分期问题》一文中强调“造反派参加文革是为了追求从政治迫害中自我解放出来。如果说造反派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这只是文革第一年的事。不久，造反派组织便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81〕同时，她还认为十年文革论是官方为了“掩盖历史真相”的说辞。不过，在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她又表示要重新考虑文革的分期问题，因为“在1973年到1974年间，社会的确再次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普通老百姓确实为追求社会公义，重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集团（虽然这些集团是以不同名目出现的……），而谱写了另一段文革插曲。”〔82〕值得注意的是陈佩华在此文中首次给老红卫兵下了定义，她称“第一批红卫兵即贬低共青团，指其阶级成分不纯，声称他们比共青团更加优秀。后来被叫作老红卫兵（在这里老的意思即是第一批建立红卫兵组织的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既得利益者特种俱乐部”。

“三年人民文革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化名萧喜东的新左派童小溪。〔83〕在郑义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论的同一年（1996年），萧喜东在美国的网络杂志《四大广场》上连发两篇论文（即《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和《“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当年稍晚一些，又将这两篇稍加修改合成一篇文章，即《“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准备发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文革专辑上，未果，后转发于《明报》并编入罗金龙和郑文龙主编的《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一书中。从这三篇文章来看，萧喜东实际是赞同“三年文革”和社会冲突之说，〔84〕他所不满的是“三年人民文革论”在对待毛的问题上与主流的一致，甚至更加否定，故而，他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者”（两个文革论）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的思想与文革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割裂开来，而不承认在中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和社会上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有着脉络清楚的联盟和对立的关系”，“持囿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来自群众的自发的左倾思想，和群众对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这些事实，感到无法接受。”〔85〕进而认

为“三年人民文革”还是跟主流妥协的结果。可是萧喜东并没有提出一套有别于“三年人民文革论”的解释，对“三年人民文革论”者的批评也有故意“歪曲”和“臆测”之嫌，比如认为“三年人民文革论”者否认造反派与毛泽东的联盟，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不管是杨小凯还是郑义乃至王希哲都没有否认毛泽东与造反派双方结盟这个事实，他们只是强调造反派与毛泽东意图的不一致。又比如萧喜东认为这些“三年人民文革论”的造反派“在清算文革、保守复旧的风潮的影响和压力下……在心理上对官方‘彻底否定’的观点让步和妥协”，〔86〕可事实上这种看法毫无根据，很多造反派是通过实践和思考自主远离了毛泽东的所谓左派理论，这不仅仅是1968年前后的“极左”，更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萧自然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否认”文革。更令人奇怪的是萧尽管是赞同社会冲突论，却在老红卫兵的问题上显出了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老红卫兵“带着革命形式、披着革命外衣来维护‘红色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种典型的形‘左’实右”；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开始，老红卫兵冲向社会，给暴力、武斗等形式造成了一定合法性，也就破坏了共产党官僚社会的稳定秩序和公检法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保守、极右的老红卫兵也是运动的点火者和传播者。”〔87〕而萧对此的解释则是“贵族发难法国大革命，而平民完成了它。”〔88〕这显然太过于简单了，而且这个话送给毛泽东才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只有毛才是真正的点火者。

官方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也进行了批判，并完全持否定态度。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化分别在1998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刊发文章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金春明在《“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再次对文革定义，并列出三点反驳“三年人民文革论”，他称：“‘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10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此其一……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动机各不相同，行为千差万别，但总体上没有超出毛泽东划定的大框框，更没有人公开明确地提出任何独立于毛泽东的理论、方针之外的政治纲领和不同目标。此其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反抗和斗争……目的恰恰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此其三。”〔89〕张化则直斥“所谓‘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两个文革说’在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中没有得到认同。……这场运动中也不存在‘两个文革’。在提出‘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两个文革’的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追求，或冲击、批判现实社会的要求。”〔90〕同时，张化也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新左的文革论。从上可看出，毫无疑问，官方是完全否定“三年人民文革论”，也是否定社会冲突论的。而金春明的一句私下里的话或许更能代表官方的一些态度，他说：“两派都是计划体制的产物，所以到改革开放彻底失落了”。〔91〕

一些学院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对“三年人民文革论”及“社会冲突论”持否定态度，主要代表人物有徐友渔和董国强。徐友渔在2011年共识网发表的文章上说“我认为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泽东文革一个派生物，一个副产品。我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认为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自觉不自觉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权的人……相比而言，人数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觉得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意义上我就不同意‘两个文革说’。”〔92〕尽管，他在其后又表示“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意义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自己的观点稍微靠近“三年人民文革论”，但还是基本同意“一个文革”说。徐友渔不仅不同意“三年人民文革论”，也不同意与“三年人民文革论”相关联的“社会冲突论”，从1995年的第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开始起，徐就对“社会冲突论”持否定态度。在《评〈剑桥中国史〉第15卷关于文革的描述和观点》一文中，徐友渔称西方社会冲突论的学者有两大不足之处，一是看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派别斗争，而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派被彻底打垮后，学生的派性斗争主要表现为造反派内部两派的斗争；二是对学生参加什么派

别的原因分析太简单，不全面。（93）并从五个方面否定了“社会冲突论”。（94）以后，徐友渔虽对自己的论断有所修改，但基本坚持原观点。董国强一开始并不反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和社会冲突论。在2002年发表于港中文网刊《公法评论》上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一文里，董国强只是冷静叙述并说：“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文革’，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无情揭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95）但是到了2006年5月，董国强对社会冲突论的评价就产生了变化，（96）在同年5月号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的《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中，董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社会冲突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盲目乐观；在‘两个文革’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简单偏执”，并称赞这些学者“关于社会冲突理论的修正和对‘两个文革’观点的否定，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认知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革’的本质属性。”（97）可以看出，此时董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和“社会冲突论”的评价就不高了。到2011年8月的《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红卫兵运动》中时，董则较为赞许魏昂德对社会冲突论和两个文革论的颠覆。（98）至2012年，在《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里，董对社会冲突论和两个文革论做出了最后的“定性”，他称：“‘社会冲突理论’显然忽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体上的非理性特征。……南京个案显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概念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兼容性——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两个文革说的偏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群众性‘造反’运动的主观自觉性，过于强调了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这显然是基于某些激进的个体经验所得出的对群众心理的严重误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是在思想愚昧和强权胁迫双重作用下发生的动乱。”彻底否定了“两个文革论”和社会冲突论。两位学院派研究者在老红卫兵的问题上，自然也得出跟魏昂德及童小溪一样的结论——老红卫兵是最早的造反者。（99）

还有一些研究者未参与论战但偏向于否定“三年人民文革论”，代表人物有宋永毅、印红标和王友琴。宋永毅（100）的否定较为明显，尽管他并未对社会冲突论和“三年人民文革论”进行直接的批评。1997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的《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一文即可看出宋的态度。在此文中，宋认为不能“滞留于三十余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的派别立场”，这会“丧失了历史研究对其的客观真实性的起码要求”，而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文革中的多数的造反派在运动中只注重于打倒某些具体的走资派，并设法使自己或自己这一派取而代之。夺取权力后，造反派头头们又大都迷恋于权力本身，很快成为新官僚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从来没有挑战过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只是设法使自己成为毛泽东所建立的更专制的专制制度中的一员”。（101）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三年人民文革论”。不过，到2015年，宋永毅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在对吴一庆文革著作的短评中，他赞同吴书中所提出的“文革‘边缘层’的概念”，认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运动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离开了‘最高指示’，甚至有意识地利用了毛的指示来追求自己的阶层和团体的利益的。因而、它们常常是‘离开了毛的文革’（吴著）。应当说该书在这方面还是颇有洞见的。”（102）值得注意的是宋永毅认为“北京的老红卫兵划为‘保守派’是一个大可商榷的论点，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只不过他们大都以更正统的立场去造‘正统’的反罢了。”（103）这就和前面所提到的否定“三年人民文革论”者一样了。

与宋永毅相比，印红标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未予置评。（104）不过，他是最早提倡红卫兵应按派系而不能以整体来研究的中国学者，（105）且在1996年时提出了文革的“三类基本矛盾”说：即三类基本矛盾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是至关

重要的；这三类矛盾是中共党内矛盾、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矛盾；三者之中，党内斗争是核心，而知识分子问题和干部群众矛盾的卷入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有区别于其他政治运动的显著特征；而这三类矛盾的充分展现集中在前三年，即1966—1969年。（106）同时，他也肯定了毛泽东与造反派是结盟的关系，称“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107）可以看出，实际上印的主张与西方的社会冲突论尤其是李鸿永的理论极为类似，就是比李鸿永多增加了一个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也很接近“三年人民文革论”的立场。不过，与“三年人民文革论”不同，也是与前面所提及的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者相同的，印红标也倾向认为老红卫兵是最初的造反者，（108）并认为老红卫兵基本只限于北京市。他对老红卫兵也作出了自己的定义，即“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109）

王友琴则与前面所提到的研究者都不一样，她的出发点则是“文革受难者”，她认为“受难者的悲惨经历是关于文革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110）“大规模迫害人、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111）不研究这样的历史谈不上逼近历史的真相。故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她就着手调查文革中的种种丑恶暴行，尤其是发生在学校的“学生打老师”事件。（112）王友琴对红卫兵运动研究中的“派性”问题不感兴趣，因为在她看来，不管造反派还是老红卫兵抑或保守派，对制止暴行都毫无兴趣，她说“当‘北航红旗’这一类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兴起的时候，他们和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冲突。但是，显然，这种冲突的内容是要不要把革命对象扩大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去，而不是他们反对‘老红卫兵’的非人道的残酷的迫害。当他们得到权力和毛泽东的‘清队’指令的时候，他们和他们反对过的‘老红卫兵’一样残酷无情”（113）既然如此，那么区分他们到底是保皇还是造反的又有什么意义呢？争论三年还是十年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与某些研究者认为的王“视角单一”“伤痕文学”恰恰相反，王友琴并不是只找受害者，而是“不但收集所有可能找到的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而且用更大的力气做调查和访谈。着力寻找‘未被报告的历史’以避免一面之词。也尽可能让不同的人讲同一事情，这样可以交叉核实并比较全面叙述事实。”（114）尽管不与红卫兵运动中的“派性”问题相对话，但是王友琴还是触碰到了现有研究所忽略的一点，即暴力与派性的问题。不过，尽管王友琴的研究极具开拓性，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王友琴过分强调自己研究的独特性，而忽略了在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其实都有人在关注暴行，只不过不如王友琴那么有系统而已。所以，王的研究缺乏与其他研究者对话的意识，在写作风格上更类似于八十年代的文学纪实，而不是学术文章，这实际上阻碍了王的进一步研究。不过，仍然不可否认王友琴为老红卫兵研究提供了很多可信的素材。

除去上面所提到的研究者，还有些文革亲历者也表达了自己态度，例如，中国科学院退休研究员王龙（笔名杜钧福）、四川的前造反派周伦佐及原北京地派的二把手聂树人。王龙并不完全认同“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但是他也不满意徐友渔等的批评，认为徐友渔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了”，没有必要在否定两个文革的同时也否定社会冲突论，研究文革“必须摒弃好/坏两元论的思维习惯”，要“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融于一体。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评论是非常到位的。同时，他对这场争论也有个非常精准的判断，即“社会冲突论包含‘两个文革’论，但不一定得出‘两个文革’论；支持社会冲突论的人不一定支持‘两个文革’论，但反对社会冲突论的人必定反对‘两个文革’论”。（115）周伦佐赞同徐友渔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批评，但是在老红卫兵的问题上，他不赞成徐友渔将老红卫兵也标上造反的标签，认为老红卫兵的“造反”创举并不属于那个时期造反的本义。从实质上来说，老红卫兵是属于保守派的。（116）聂树人则

直斥老红卫兵完全不能算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也不相同，将老红卫兵算成造反派不符合历史事实。（117）以上可以看出尽管这三人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老红卫兵的态度是一致的，不赞同现有研究中将老红卫兵视为最先造反者的观点。

2006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记忆》《往事》《昨天》等研究刊物通过网络的发行，国内民间研究开始可以绕开官方的审查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关于“三年人民文革论”的争论反而渐趋平静，最新的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批评还是来自美籍华人乔晞华（118）和郭建，（119）“地方文革”的研究思路逐渐兴起。

（120）尽管有关“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的争论并未有最终的结果，对其否定和批评的声音一直很多，但是这场争论在客观上促进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一批主要研究造反派的著作因此面世。如童小溪在其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文章的基础上扩充成了《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徐友渔则在1999年出版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印红标则在2009年出版了《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周伦佐则在2006年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2015年乔晞华出版了《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对造反派的研究。

反观未进入这场争论的老红卫兵们，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过去也有所回顾，（121）但影响甚微。较有影响力引起公众争议的是卡玛（Carma Hinton）（122）于2004年左右拍摄的红卫兵运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这部影片虽然采访了一些造反派和大学红卫兵，但受访者绝大多数都是中学的红卫兵，基本观点和老红卫兵派一致，并间接引发了宋彬彬和王友琴就卞仲耘被打死事件的争论。北京八中的老红卫兵陈小鲁也组织过道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反响来看，显然人们不认为道歉就离历史的真实情况近了一步。而较有学术性的则是原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卜伟华，（123）尽管他因研究文革而遭到惩罚，著作更无法公开出版，但他仍坚持为红卫兵运动尤其是老红卫兵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材料。他倾向于把老红卫兵算作保守派组织。（124）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的老红卫兵都保持沉默，（125）小部分老红卫兵的回顾和研究离揭开历史的真相还有相当的距离。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的老红卫兵研究主要围绕着老红卫兵是“造反”还是“保守”而展开，但区分“造反”或“保皇”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是文革时的标准，有的则是文革后的标准，（126）讨论时常陷入“鸡同鸭讲”的情况。除了“造反”还是“保守”外，思想史也涉及较多，如关于血统论的讨论，很少涉及其他的主题，例如老红卫兵与暴力的关系、老红卫兵与高层的关系、老红卫兵自身的组织情况、老红卫兵与文革前教育的关系，等等，这也使得关于“派性”的争论变得十分狭隘，丧失了其本来应有的意义。

（未完待续）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